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

秦亚青 阎学通 张文木 时殷弘 冯绍雷

方法论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了强化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自觉,《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编辑部于2003年9月2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学者参与了讨论。以下笔谈,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可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外交学院教授 秦亚青

国际关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方法论问题上也存在所谓的科学派和人文派之争。科学派基本上持研究方法一元论的观点,寻求具有共时性的普遍规律。人文派却认为社会问题无法囿于单纯的科学方法。科学派与人文派竞争的表现形式是方法论的竞争,但却有着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我想首先讨论一下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分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方法论分歧,然后提出一种科学与人文契合的第三种方法。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

作为人,我们生活在两个相关的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两个世界里分别存在两类事实: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社会科学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围绕这两类事实展开的。

自然事实是客观存在,是“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这些事实是独立于人脑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独立于人脑的规律。桌子、黄河、空气、原子、粒子都属于这样的客观事实。社会事实是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事实。它很难像自然事实那样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社会事实的存在取决于人的实践行动,取决于主体间的共识。所以,社会事实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的制度的产物,也是人作为主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婚姻、象棋规则、财产权、主权都属于社会事实范畴。

自然事实不具主观性。所以,自然事实的基本属性是它的物质性,这就决定了其物质性本体特征,自然事实的意义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不是“那在”。社会事实是客观外在和主观

内在的融合。这样，社会事实就有了主观性的一面，观念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之一。在许多社会场景中，观念因素甚至是主要特征。这就是社会事实的理念性本体特征。如韦伯所说，我们都是文化动物，具有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对待世界并赋予世界意义的能力和意愿。

由于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所以，社会事实的属性首先导致了本体论分歧，在国际政治学中也是如此。对于国际关系的世界到底具有什么属性这一问题，科学派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世界的现象是客观存在，国际关系的活动具有客观规律，所以，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与物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就是这样的客观存在。人文派则认为，国际关系的世界中有许多现象具有很强的人为成分，国际关系学是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获得意义的，所以，从本体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和物理学是根本不同的。人文派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性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性建构。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认识论的分歧。对于我们以什么方法获取对于国际关系世界的知识这一问题，科学派学者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就是要发现这些规律，说明（explain）现象之间本来存在的因果关系。人文派学者则认为，社会事实许多都是人的建构，所以，只能以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式获得知识。结果出现了两种认识论：一种是科学实在论，坚持以说明获取知识；一种是解释学，坚持以理解和解释来获取知识。

二、方法论之争：实证主义与解释学

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歧在方法论方面自然有所反映，表现为国际关系学中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派两种方法论的论争。

国际关系学在一战之后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以来，原本与历史学和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研究也多是从事历史和法学的角度、以解释的方式展开的。实证主义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是行为主义革命的结果。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在1950—1960年代，主要是政治学领域的方法论论争。之后，美国国际关系主流学派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其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命题。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莫顿·卡普兰的国际系统理论等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学方法论的典型代表。可以说，行为主义革命确立了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话语地位，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学中的实证方法遵循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主流学派理论家承认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真实存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发现客观规律，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试图发现在无政府秩序的国际关系世界中主要行为体有规律的行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直致力于发现关于规律的通则：既然国际关系作为科学学科的目的是超越具体的客观事物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其理论也是超越时空的元叙述。其次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分离、研究本身的价值无涉是可能的。第三就是经验性验证。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证实和证伪是社会科学的关键。实证派认为虽然波普尔素朴证伪主义的极端性是不适宜的，但是，不能被证伪的命题不是科学命题这一原则必须坚持。不过，检验的目的是确定理论可以解释多少事实，证伪的过程是发现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效度。验证的基础是系统的、可信的数据。

然而，解释学方法却也没有销声匿迹。解释学方法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韦伯的方法论思想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解释学的基本假定是，社会世界不是自然世界，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对于自然事实，可以采取发现规律和说明因果关系的方法，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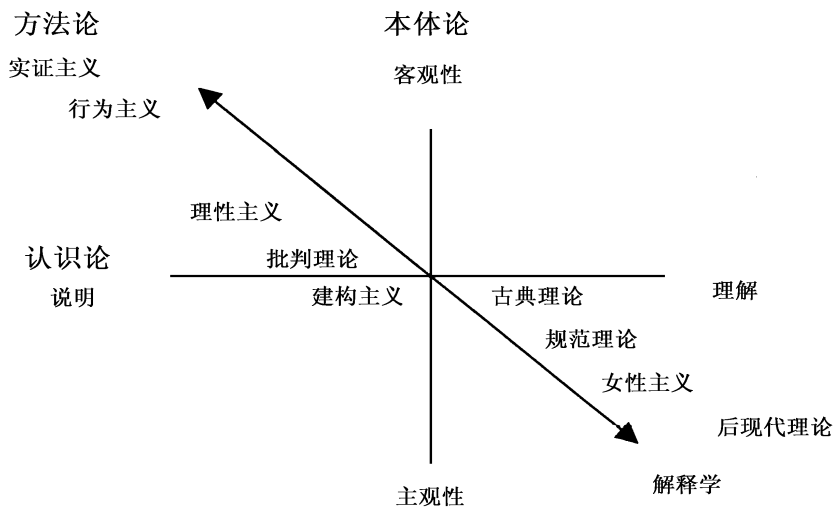
学术的目的不是发现规律，因为自然界的规律在社会界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意义。在社会世界中存在一个由行动者通过其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意义网络，这种意义网络是社会的独有特征。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是通过这一意义网络得以实现的。

解释学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着自己遵循的原则。首先，解释学学者严格区分了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不同。由于所有分析都深嵌于语言和历史之中，个人的信仰、前意识和身份定位等既能够使他们理解社会事实，也制约了他们的这种理解，故发现完全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的。其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行动者赋予行动以意义，行动者之间的共有观念使得他们能够赋予社会行动以意义。社会科学要解释的正是这种存在于社会界行动者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自然界不存在这种关系，所以，将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化约为自然物质活动和自然规律的实证主义原则是行不通的。第三，由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和自然事实属性的不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目的方面的不同，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理解的方法，即以社会构成的意义和符号网络去理解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

以上对比表明，实证主义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主客体的可分离性和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性，而解释学方法则注重社会事实的主观性、主客体的不可分性和社会科学的价值有涉性。所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说到底，科学派是尽量减弱人的作用，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重物质世界、理性规则与客观规律；人文派则彰显人的作用，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人学，重社会实践、观念作用和文化意义。

三、第三种方法：人文与科学的契合

以上讨论是借鉴了韦伯理想类型的思维，将国际关系的科学派和人文派都以各自的纯形式表述出来，故可称为唯科学派和唯人文派。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领域，纯而又纯的理想类型的唯科学派和唯人文派是很难找到的。现有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从本体、认识和方法三大方面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行为主义、理性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古典主义、规范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修改和补充了 R. 杰克逊 (R. Jackson) 和 G. 索伦森 (G. Sorensen) 所做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



如图所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代理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理论，包括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古典理论和规范理论等，都是虽有偏向，却兼而有之。也就是说，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融合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也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融合。虽然融合的程度不一、纬度不同，但是融合本身却是大部分理论的方法论内涵所具有的基本性质。

韦伯早就说过，社会学是一门试图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科学，目的是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原因性说明（causal explanation）。所以，除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之外，大部分属解释学范畴的理论并非反科学，韦伯的思想就是一种相互融合的思想。现在，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至少可以看到三种融合科学与人文方法的尝试。首先是温特建构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尝试的中间道路，即在本体论方面强调国际关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因素构成的，其社会属性超过自然属性，但在认识论方面则采用涂尔干的理论，认为社会事实基于主体间共识，具有客观自在性。这样，就可以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其次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并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布赞等英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在本体论方面，他们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重视物质力量的作用；在认识论方面，他们主要是诠释历史进程；所以，在方法论方面，则更多使用了解释学的方法。但他们的目的是发现国际体系的进化形式，是建立科学理论。第三种是理性主义和规范理论的结合。科学派基本上将规范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因为规范已经不再是自身同一物。但国际规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规范研究。唯科学派认为理性为科学提供了永恒动力，但规范本身则更多的是理性范畴之外的观念结构。但是，即使对规范的研究也可以和理性结合起来。费丽莫（Finnemore）和西基克（Sikkik）特别提出在规范发生、发展过程中理性选择和观念意识结合的重要意义。虽然有人认为科学与人文水火不容，但实际上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都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冷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界的方法论发展趋势是在中间地带中更多地朝人文方向移动。这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表层来看，行为主义以来科学派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冷战后人文派的反动。科学派理论对冷战结束和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现象解释乏力，所以，人文派提出，国际关系属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具有高度的人文成分，其复杂性是难以化约为简单的科学公式的。从较深层的角度来看，科学派的方法论前提，亦即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包含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将主体视为目的，将客体视为手段，这样做忽略了存在的一个根本方面——主体间关系，也不能解决人类社会中生存的自由本质和平等承认问题。所以，思想界从启蒙运动的主客二分和理性主义向主体间共存、对话、交往等方面偏移，开始扬弃主客体性思维，并沿着主体间性思维向度发展。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表现就是从发现和说明客观规律的科学方法到理解主体间意义的解释学方法转向。

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回顾发展历程，我以为，我们缺乏两种与方法论相关的自觉和一种与社会学相关的反思。

首先是缺乏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觉。在1980年代，我们缺乏对方法论本身的自觉。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国际事件的叙述和分析，被称为较为深刻的新闻评论。

到了 1990 年代，我们开始意识到，如果国际关系学要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没有方法论是不行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注重并介绍研究方法。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对科学方法论的强调力度大大增强，不少论文表现出明显的方法论意识，专门讨论方法论的论文和教材也出现了。但是，这种意识仍然停留在方法论表层上面，至多是器物层面的意识和理解。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需要严谨的方法，但仍然缺乏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自觉，也没有将方法论的讨论加以深化，而这种深化必然涉及本体观和认识观。当人们使用世界政治替代国际政治的时候，反映的是他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转变，这种转向自然反映到方法论层面上来，于是，人们便重新认识世界体系中的单位行为体和行为体行为。方法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密切相关的，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的思维是无法真正解决方法论问题的。

此外，我们还缺乏对国际关系学终极关怀的反思。近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就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论争，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反映了我们开始自觉意识到这些涉及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学者为什么要坚决支持或坚决反对科学或解释学的方法论呢？我们是否对这一问题本身也具有自觉呢？我们是否反问过自己国际关系的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终极关怀有何关系呢？国际关系属社会科学，说到底，是以人为核心的研究，其终极关怀也应该是人：人的组织、人的行为、人的观念、人的尊严等等。有人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缺乏对理性的意识，而理性是科学的内核。西方有了启蒙运动，所以发展了科学，导致了我们的落后。冯友兰也说过，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这没有错。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才大力提倡科学方法论，强调理性和实证的重要意义。但是，理性的基础是人文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先有文艺复兴，后有启蒙运动；先有人文精神，后有理性主义。缺乏对理性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因为缺少人文精神这一理性的根基。国际关系方法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基底、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现在，扎扎实实的国际关系实证研究成果仍然很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弥补，有的年轻学者甚至在做矫枉必须过正的尝试。但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反思性理解和解释学方法又走到哪一步了呢？真正尝试两者融合的方法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成熟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方法论原则是多元主义。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底。科学和人文两种方法都会走向极端：人文走向极端，发展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本体的虚无和认识的缥缈；科学走向极端，则使科学成为神话，导致人的死灭和作为科学灵魂的质疑精神的消失。故在社会科学领域，唯科学和唯人文都无法永久地占据方法论的王位。因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斯诺命题，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路径：人文与科学的契合。当然，基本的假定是，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如此，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

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阎学通

自 19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分析国际形势和历史事件走向理论研究，现在又开始注重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国际关系界的研究水平正迈上新的台阶。国际形势与历史事件是国际关系的现象，国际关系理论是对这些现象后面的规律做出的解释，而研究方法则是获得这些理论解释的手段。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关注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

考虑如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了。笔者认为，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在于采取科学性强的研究方法，而自觉采用科学方法的基础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识。

研究方法不是理论。理论是用一套有机的逻辑关系对客观现象做出的系统解释，而研究方法是研究现象和创造理论的手段、门路和程序。为了理解上的方便，可以把研究方法简单化为工具，把理论视为用这些工具创造出来的结果。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同一国际关系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可以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理论视为同一件事，就可能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也是各有所长，无法进行客观的优劣判断。然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否比其他研究方法有更大的优势，是通过客观比较它们的功能来判断的。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不是创造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学派，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等。这些理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不同，例如，现实主义从利益和权力的角度解释国际行为，自由主义从规则和制度的角度解释，建构主义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解释。不同的理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区别是范式的区别。然而，范式只是解释现象的出发点或角度，而不是研究方法。范式的区别是研究者主观认识和假设的区别，而研究方法的区别则是客观研究手段的不同。主观范式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以不同范式为基础的研究。虽然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论范式是否有阶级性和是否有国别性的问题还有争论，但他们都可以同意研究方法是没阶级性和国别性的。研究方法是工具，工具是可以被任何人、任何阶级和任何国家所使用的。是否采取一种研究方法取决于是否掌握这种方法和这种方法是否能达到目的。

科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多种研究方法都归为科学的方法，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以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则可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

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如果某种研究方法没有这样的程序，特别是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的环节，这种研究方法就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国际形势评论与国际关系学术论文相比较，前者的结论之所以不被视为是科学的结论，原因之一是这种结论一般是没经过概念操作化和实证检验就得出来的。为了保证结论的可检验性，科学方法就必须依据共同的规则来制定检验或判断的标准，因为没有相同的标准就无法对假设或结论进行检验。例如，由于没有根据时间的共同规则对“可见的未来”这一时间概念做明确规定，因此“可见的未来”可以被理解为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由于没有相同的标准，就无法检验以“在可见的未来”为前提的预测是否正确。巴以冲突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如果没有时间限定，预测巴以冲突将紧张或将缓和都会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以时间的共同规则确立约定预测的时间标准，就可以根据约定时间内的阿以冲突的变化情况检验预测是否正确。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并不必然对立。科学研究方法是为实现研究目的服务的，因此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其他能够达到研究目的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研究方法不但可以与其他研究方法共存，而且可以交叉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仅限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也可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知识是开放的，科学的原则是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有被完善、改进和否定的可能性。这一科学原则决定了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能保证研究目的的实现。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以许多研究的失败为基础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将未能实现研究目的的研究方法视为不科学的方法。可见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并不由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来决定。使用巫术也

有预测正确的时候，但正确的预测结果并不能使巫术成为科学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不等于一种理论被接受的普遍性。可以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理论是多种类型的。在诸多种类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科学的理论对人类来讲并不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例如，神学对战争的解释是人的原罪导致战争，而科学理论则可能从战争成本收益的角度解释战争行为。世界上信教的人远多于不信教的人，因此原罪的理论解释比战争成本收益的理论解释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但是，被接受的普遍性并不能使原罪的解释成为科学理论。

社会科学的第一属性是科学。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于是就产生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建立自然科学研究那种可以完全控制变量的实验室，这使得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国际关系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必有科学的属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共同属性就是它们的科学性。国际关系研究如果是科学的，它就不能不做实证研究。

科学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一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这一点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而是由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科学是指实证的知识体系，科学性就是指发现和展示科学知识的原则与方法。例如，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要发现和展现这些知识体系都需要使用明确的概念。如果概念不明确，就无法明确地描述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说清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不成为科学知识。例如，文学追求语言的丰富，读者对一首诗歌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读者的感受差别越多，越说明这首诗的含意丰富。然而，科学论文对语言的要求恰恰相反，要求用词没有歧义，要使每一个读者对同一个科学结论有完全相同的理解。数学语言是最没有歧义的，因此人们认为用数学表达的道理是最科学的。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研究成果。

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科学研究方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研究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科学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 它可帮助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手段。与简单枚举法不同，采取变量控制的方法不但可以帮助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还可帮助观察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2. 它可帮助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定量分析是科学方法中操作化的重要形式。与定性分析不同，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还可以帮助认识事物的变化程度。其他研究方法则难以做到这一点。3. 它可帮助提高预测准确率。科学方法强调实证的检验，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的可重复性。提高了结论的可重复性就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性。科学研究方法在上述三个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优势并不局限于此。

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在科学原则与要求，有助于培养使用者的科学态度。使用这种方法就必须明确所使用的概念，采取没有逻辑矛盾的分析原理，坚持统一不变的衡量标准。研究者长期坚持这些严格的要求，有助于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制造涵义不明的新词汇和新概念，不对国际现象做无实证依据的因果解释，不做无法检验的国际形势预测。科学的理念是，任何已有的知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人一定承认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承认了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者也就能接受采用科学方法的研究成果也会有局限性的观点，因此就能有思想准备，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客观实际不符的事实。由于采取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承认自己研究成果的缺陷，这也有助于培养研究人员承认学术错误的品德和改进学术观点的勇气。

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自 1980 年代初以来，简单枚举的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还是支流。多年来大家所

关心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可能与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普及有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定量分析能力差有关，因为对国际关系的程度变化认识不清，所以深入不下去；二是可能与不掌握寻找新问题的方法有关，因为不知如何去寻找有科学意义的新问题，因此总是重复研究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加强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将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尽快摆脱低水平重复的困境。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还很薄弱，因此对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要加深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就要提高对国际关系程度变化的了解。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变化是量变不是质变。以中美关系为例，我们需要知道中美关系从1980年代的准同盟关系转变为冷战后的非敌非友关系，还需要了解它在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之后发生了什么程度上的变化，即量的变化。目前，在我们所知道的研究方法中，还没有什么方法比科学方法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国学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精确程度。

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能否得到普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能否普及。现在大专院校国际关系专业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还较少，随着方法论的教学在大专院校的普及，国际关系学界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人会多起来。二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效果。研究方法是用于实现研究目的的，如果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取得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好的研究效果，那么科学方法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所采用，反之则会被抛弃。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上看，科学研究方法的采取相对较晚，但却取得了较为让人信服的结论。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方法论著作或教科书基本上都是讲授科学研究方法的，关于其他研究方法的著作还很少见。这说明其他研究方法在系统性和传承性方面都没有科学研究方法发达。

希望科学的研究方法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走上新台阶提供有效的途径。

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逻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文本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相应地，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像圆一样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支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20 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者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即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更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 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的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78—479 页。

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相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形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的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可以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颠地带，而是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明白的表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的。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0页。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的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科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附带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倾向，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的原则。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变化，如果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文革”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窒息科学僵化思想。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国际关系理论与评判的若干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时殷弘

一、辩证地看待当今国际关系理论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思想传统所提供的遗训有很多是适用的。然而，如果只怀抱现实主义的观念、思想方法和“理想”，那么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认识和战略研究就会忽视或轻视那些不属于传统权势政治的、但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客观实在，就很可能陷入传统权势政治的循环，找不到一条争取逐渐超越传统权势政治的道路。就中国的国家战略来说，我的不少文章都是试图探讨这么一种大致的途径：既实际可行和保证中国至少不在国际权势政治中“输掉”，又争取超越国际权势政治、安全两难和地缘政治困境。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是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仍然可以、也应当受到现实主义的有益的重大影响。现实主义、主要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遗训在很多方面都有高度的适切性。

建构主义是一种颇有生气的国际政治理论。当然，它还没有达到、大概也达不到一种总体理论的阶段，不能说明国际政治的全局。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势或利益看成既有的、现成的东西，然而利益和权势怎么得到规定，世界秩序到底从哪里来，它没有解释，甚至没有提出这样问题的意识。实际上，观念的生成和演进非常重要，它们对现实的塑造作用非常大。建构主义用一套科学形式的逻辑和话语，系统和深入地解说了关于国际政治的最基本观念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这些被“建构”出来的观念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和塑造国际政治的基本机理。或者更具体地评论说，建构主义理论“论辩国家利益高度可变，并且是通过观念、角色和互相作用模式的一种结合被建构出来。这意味着各国并非不可避免地囿于永久的安全两难之中，存在避免无政府和主权的最危险后果的途径，而且通过学习和合作有可能形成国际调解和治理的新形态。”（K. J. 霍尔斯蒂语）这是个很大的创新，而且可以予以广泛的延伸，丰富和优化对于国际政治的一整系列理解。当然，它在理论上远没有做到炉火纯青。

需要指出一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它对于所有的世界政治学者和学生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当代世界政治处于一个变动和延续相结合的过渡时代，因而带有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各自所强调（并且往往据此以偏概全）的基本特质。一向善于博采众长、提防极端的加拿大国际政治学家 K. J. 霍尔斯蒂中肯地指出，当代世界政治兼有现实主义理论、国际社会学说、“多元—互相依赖模型”、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社会模型”各自予以突出的种种要素。因此，需要在辩证地看待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同时，辩证地对待所有各派国际关系理论思想。

二、“国际关系理论”现今流行的界定方式的“贫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大多数方面确实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近乎压倒性优势。但考虑到其他某些并非从美国产生的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及其广泛的国际性影响，考虑到欧洲在一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重大贡献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我们需要避免将

美国的上述“近乎”压倒性优势高估为压倒性甚或垄断性的。

鉴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近年来一种广泛流行的现状，必须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至关重要。是否只有国际关系学科于 20 世纪初在英美建立以后，包括在它的理论性研究分支中的那些东西才是“国际关系理论”？甚或只有汉斯·摩根索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才是“国际关系理论”？难道 20 世纪或摩根索之前历史悠久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思考（甚至某些较系统的理论构建努力）应当被撇出“国际关系理论”范畴？难道我们的学者只需关注、介绍和评判主要是“新”的理论？难道我们主要注重的应当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的当代或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研究？难道要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部分变成对美国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学说动态的跟踪研究？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国有关学者就总体而言，在展示和研究外国理论学说方面应以综合方式而非微观剖析方式为主。“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广义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想或理论性思维，也可说是一类广义的“抽象经验和理论化”。与此相关，理论应当做到、也可以做到既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也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践家有吸引力。

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与历史考察和基本哲理思考

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特别注意历史的考察和历史教益的辨识与升华，那么这并不限于现实主义者。经典的（以及当今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有许多也是如此。然而，尤其是经典现实主义者差不多全都侧重于历史考察方法。经典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归纳方法，重视历史遗训（甚或过分重视，比较保守）。但是在另一些流派的思想传统里面，历史考察也占很大分量。像“英国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历史学问修养、历史理解，以及将历史与理论有机结合的能力绝对不亚于基辛格等。基辛格考察历史无非是看到权势政治，但英国学派的领袖人物不仅看到权势政治，还看到亦属紧要的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政治文化，包括法理文化和伦理文化。因此，几乎所有真正高明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从历史教益、历史经验汲取营养，否则他大概不过是搞“学问技术”的人。历史考察和历史描述非常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要以历史为师，首先比较知道甚至比较熟悉历史，同时对历史有理论化的思考，从中升华出历史的一些内在含义和具有历史共性的机理。

任何学问都应从理解它的最基本的 ABC 做起。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只了解当今和近年、哪怕近三四十年的一些流派就够了吗？只了解冰山的顶峰就够了吗？甚至还不一定是真正的顶峰。最新的东西有时不是、甚或往往不是最好的东西。因此，对于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国际关系史乃至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演变历程的基本理解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所谓大师们的思考是有一定特点的，他们从 ABC 思考起。几乎所有的大思想家首先思考并向人们说明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例如讲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话，就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社会和国家，什么是好的社会和国家，怎么做最根本的道德判断等。要从基本的问题谈起，像道德与权势、道德与利益等等。当然完全不是说每个人写的文章和讲的课程都要谈这些问题，但要有谈谈这些问题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往往比知道多少新的流派、看到多少去年或今年出的书有用得多。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努力方向

应当从下列三者的有机结合出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进行努力：（1）中国问题、中国

价值取向、中国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国话语”；(2) 世界各项基本潮流和中国的健全发展方向；(3)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广泛学习和有选择的借鉴。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应有的根本方向。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目前的现状，尤其需要强调“中国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要真正解决（用资中筠先生几年前的话说）“六经注我”为主还是“我注六经”为主的问题。要“六经注我”为主，就必须以“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为主，相对地通融“六经”，即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适宜可用的各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富有内在逻辑地、有所侧重和有所限度地兼容并蓄。一定意义上就方法和方法论而言也是如此。而且，这里的道理无论是对于理论性地研究实际问题，还是对于构建理论本身，都是适用的。

关于全盘创新与“拿来主义”。全盘创新从来是部分“革命主义者”的幻想，而“拿来主义”固然可能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更坏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成为创造性努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从事“拿来主义”实践的人明白它只是阶段性工具之一。干脆说，永远不可能有“全新的”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学说；如果确信会有，那它也不可能真正“全新”，也不会是多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真正信奉的，因而谈不上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学科性问题的若干构想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冯绍雷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与成熟都有着原则上共同遵循的逻辑过程。

国际关系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赖于是否完成以下这一发展进程：首先，是“多学科”阶段，即国际关系从其他已经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中攫取有关的范畴、方法与知识来充实自身的阶段。年轻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需要从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乃至心理学、地理学、数学等学科领域攫取养料以完备自身的学科基础，以应对浩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学科研究对象。其次，是“跨学科”阶段，即国际关系研究从相邻成熟学科领域借用有关范畴、方法与知识之后，逐渐形成本学科领域所独具的若干学科范畴的阶段。如同经济学中有“价值”、政治学中有“权力”等范畴所起的支撑作用一样，没有为本学科所独具的知识范畴是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领域的。最后，才是所谓“单一学科”阶段，即经过一个长时期吸收消化与自身成长的过程，不光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客体及其知识信息、研究方法与学术范畴，而且这些学术范畴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与相对清晰边界的范畴体系，到这时，国际关系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门独立、完整、成熟的学科门类。从目前整个国际国内的学术积累情况而言，恐怕最多是刚刚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跨学科”阶段的学术发展进程。

对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状态做上述界定，完全不是贬抑海内外本界同仁所作的艰辛努力以及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恰恰相反，就国际关系研究所面临学科研究对象的极其复杂性，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特有的研究条件的局限性而言，国际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比如外交档案的公布通常要在30—40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面世，也许这对于历史研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国际问题的决策却要求本学科做出即时的判断，提供当下的知识。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这一领域所具备的知识与信息质量，特别是要对当前问题做出判断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其次，每一个学科门类中派别林立，语出多门应是自然现象，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与一般其他学科领域不同的是，它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国家，国家间利益与理念的分殊，使得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对于观念知识、信息、范畴、方法的认同出现相当尖锐的争论，

这些争论对于学科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规范中带有很大程度的各自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背景。第三，国际关系研究远远不止是各国外交政策或双边与多边国际关系研究的简单综合，它所涉及的国际国内各个领域的知识面之广，知识更新之迅速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知识门类高度分化的时代，要全面驾驭百科全书式的国际关系知识领域，这对研究者本身的学养积累、研究手段甚至是交往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中国其他基础及传统学科尚须进行规范化建设以及大幅度知识更新的背景下，作为新兴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较难期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从研究者队伍到研究成果都即刻成熟起来。

当然，每一门学科的成长都有其特殊的艰难历程，都面临着各自的当前挑战，所以问题还须从学科发展的自身构建不足中来进行观察。

若从学科成熟必经历上述阶段来看，其核心问题在于本学科系统化知识积累基础上的范畴与概念体系建设。从此来看，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运用的范畴或概念绝大部分是直接来自其他学科借用的，鲜有为本学科所专用的范畴与概念。即使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流派的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其所运用最基本的概念与范畴，大体上都是从政治学、法学或伦理学沿用而来，至多是结合本领域知识对上述概念与范畴做了阐发。

国际关系研究并非没有自己专有的概念范畴。比如“势力均衡”，这是起自于马基雅弗利，中经 19 世纪欧洲政治家诸如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发挥，到了 20 世纪又经过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谋士兼理论家的精心加工，终于成为一个专用于国际政治的具有广泛学术功效的范畴。即使如此，“势力均衡”还是与政治学中的“权力”范畴有着太直接的联系。其他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常见的比如“孤立主义政策”，较多指向外交取向中的中立自保，以及“遏制政策”，较多指向采取诸种压力合围于对手的对外战略。虽然这些概念专用于国际政治，但显然与权力政治密切相关，尚未脱胎于政治学的学术演绎逻辑。至于像“地缘政治”这样的学科门类，尽管在国际政治的学术与实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它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一个分支的概念创制和范畴演绎此种使学科体系化的工作又太过薄弱，以致百余年来难以看到这一门类有几本概念精确、逻辑演绎严整的重头学术著作。

难怪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经常会听到一些尖锐的自我批评，如英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思想家的马丁·怀特于 1966 年发表了“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的文章。到 1990 年代中期，那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在国际学坛经历了好几个理论回合，在国内也已取得相当广泛的影响。但笔者还是读到几篇美国学者自我批评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谁还在听信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决策部门的脱节与疏远，乃至对于其理论功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许，一个学科门类，特别是发生在这些学科门类作为立身之本的基础理论领域的自我批评，不应该是评判这些学科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准。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哲学都可以听到这一类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自我批评。关键的问题在于学科基础理论核心部分的独立严整以及学科知识是否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指导实务、规范行为以及充实理念。

从需求角度，以及从海内外国际研究界同仁前赴后继的工作状态和成果积累来看，国际关系研究在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被构建成为一门能与学术界其他已经安身立命的新老学科相匹配、相辅佐的独立领域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样开创性构建性的学术努力也会无比艰辛。

依笔者愚见，从国际政治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际需求出发，并从遵循国际研究界已有成就及未来具有拓展潜能的学术领域出发，以下方向是尤其值得关注和下大力气进行攻关的。

第一，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IPE）。这是一个晚近二十多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门类，但这一门类的学术解释能力与覆盖能力已经引起圈内圈外人士的广泛关

注。顾名思义，这一学科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国际社会的结构变迁，探讨国际体制的形成与流变乃至各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政治经济背景及其效应的一个知识门类。大约十年以前，这一学科门类主要侧重于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背景、形成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但近十年来，则尤其侧重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国内事务的相关性研究。在全球化的浪潮愈益打破各国和各地区的藩篱，同时各国各地区的本土利益、意向与情结对全球化做出了不同样式的反应态势之后，不光各国对外战略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而且整个冷战后国际体制的构建处于明显的意见对立状态。从19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春天的伊拉克战争，整个国际社会的动荡播迁大体可视为这一学术领域之所以崛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以各自富有特色的研究而发展这一领域的学者虽然在范畴构建方面未曾超越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态势，但却在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料的积累方面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这一门类的研究对于中国具有特别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第二，国际关系中的文明与文化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关系就是文明间的关系。“文明冲突论”之所以激起十余年来国际学界乃至媒体与平民的长期争论，原因就在于人们意识到文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在国际研究领域远远缺乏深思熟虑的理念指导和丰富扎实的实证分析的一个领域，但同时，文明与文化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与冲击却与日俱增。虽然对这一领域学科知识体系的创制会遇到无比艰难的挑战——光是一个国家文明形态的研究就已经足以使多少代人皓首穷经，何况是进入“国际文明研究”。但是，哪怕是从小非常具体的某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开始，都会对这一方面的国际实务和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效益。在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怎么能够甘心于文明、文化与国际事务脱节，或者怎么能够承受这一领域顺从帝国话语霸权的结论而处于理论苍白的状态。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应该义不容辞地在这一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之于国际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和时段要远胜于目前流行的美国式“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此类范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笔者最近与同事们译毕的《欧洲的未来》一书，提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影响最大的四位思想家是马克思、李斯特、凯恩斯及哈耶克，这四位思想家的影响远远压倒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范畴。例如，近年国际风云变幻中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凸现，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非常明显地受到了新保守主义思想路线的直接影响，很难简单地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这类概念对之进行概括。又如，像冷战的终结这样的历史巨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些范畴所能解释的范围，而对其动因的分析恰恰透露出思想史上重大较量的痕迹。上述事例说明，对政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实际过程之间互动的研究，乃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薄弱环节和当务之急。

至于从建构主义等学术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化，至少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都是大有意义的。总之，一个真正独立、边际清晰而具有完整学术范畴与规范的学科体系需要多方面的长期营建才能成功。

〔本组文章责任编辑：王好立 李存娜〕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rests in proper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4) Leg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Financial Repression

Lu Feng Yao Yang · 42 ·

In an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financial repression, legality may set up barriers in some field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ur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1990s from Chinese provinces suggests that legality facilitates bank loans to private sectors and stimulates competitions in bank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discourages private investments and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inancial deepening. Such effects are resulted from the “leakage effect” in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a process by which financial resources in bank loans flow to the discriminated private sector from the privileged state-owned sector. In addition, our findings show that legality has little effects on the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We conclude that legal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only when other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well established.

(5)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rket Order

Zhou Ye'an Feng Xingyuan Zhao Jianyi · 56 ·

We measure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result with some indicator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analysis is employed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general factors, marketiz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petitive activities on GDP per capita.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competition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capital, regional trade environments and institution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That implies the necessity to reconstruct market order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institution for a sustainable path to growth.

(6)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s from Alex Inkeles' Study on “Becoming Modern”

Feng Xiaotian · 66 ·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s and analyses are carried out to Alex Inkeles' s well-known study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n to modern man in terms of research design, concept measuring and data analysis, to reveal the embodied spirit of science. We conclude that the spirit of science represented by logic, vigor, practicality and respect for the truth make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empirical social stud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social studies, we must recognize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science as such.

(7) Methodology i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en Discussion

Qin Yaqing Yan Xuetong Zhang Wenmu Shi Yinhong Feng Shaolei · 78 ·

The absence of methodology has created an unsurpassable barrier blo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September 20, 2003, the Symposium of Methodology i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held in Beijing, jointly sponsored b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World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call for more awareness in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ies. Appeared at

the symposium were scholar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Nankai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ated institutes of CASS. This pen discussion results from part of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ymposium will appear in the first issu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2004.

(8) **Global Governance : 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Cai Tuo ·94 ·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prevailing Western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needs a theoretic perspective of its own: a global governance at national level. According to this national and theoretic persp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is to be integrated as localized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t should focus on management of global problems, and be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democracy. China is practicing such a type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viding fresh and helpfu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s to the world. Several lessons may be learnt from China's experience: (1)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epartments is the basic form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global governance; (2) while government still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notions of power and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fficials are undergoing a change; (3) the awareness and values of globalness embodie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are far from adequate for a global change; and (4) the construction and awareness of civil society is a precious leg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9)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From Dialogue to Innovation**

Zhao Jianying Chen Xueming Han Donghui Peng Yongjie Zhang Tingguo Bai Xi ·107 ·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and rapi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man depends on new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cope with global problems that threaten hi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are therefore intrinsically necessary and coming to the fore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philosophy. However, the stud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 long established academic, pedagogic and evaluation structure, resulting in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providing theoretic support to China's development. It is even harder for them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guide people through their lives. To promote theoretic innovation and update the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symposium was held in Guilin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jointly b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of Suzhou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Sept. 25 and 29 of 2003, under the name of "Cultural Conflicts and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 Forum on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The contributors of the following 6 papers were all at the symposium. We hope that this will lead to a cross-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exchanges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ical study, and that perspectives will converge to give birth to a new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bears the characters of our time and our nation.